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千里眼順風耳 (六)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琅

主持空軍無線電台

民國卅年(一九四一)十二月的某個禮拜天，日本大批飛機襲襲夏威夷珍珠港，使美國海軍損失慘重，航空母艦被炸毀了八艘之多，佔全軍兵力的一半，飛機被毀一百七十多架，人員傷亡四千多，震驚了全美國民，迫使美國對日本正式宣戰，在同月十一日，德意兩國爲了對日本履行軸心國家的義務，也向美國宣戰，戰火燃燒到全世界，打得更熱鬧，我國以劣勢裝備，憑着血肉和勇氣，和強悍的敵人拚死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抗戰了四年多，至此得道多助，終於和美國盟邦，攜手并肩共同作戰。

一九四二年元旦，空軍無線電總台和空軍通信學校奉命成立，這兩個單位，係根據通信會議決議案所產生，大家都知道，要建設空軍，首先

要把通信搞好，要搞好通信，培植人才，擴展業務，齊頭并進，實乃當務之急，通信學校校長係軍事委員長 蔣公兼，教育長奉派爲吳順明，無線電總台長程培豐，我被派爲副總台長，我在昆明返回成都後，就在總台附近買了三間簡單的茅草屋，把家眷安頓下來，上下班很方便。

不久，昆明王叔銘司令來成都，他因昆明新近成立一個防空情報總台，力邀我去昆明担任首任總台長，我因剛剛從昆明回到成都，拖家帶眷，長途跋涉，經過兩次翻車危險，驚魂甫定，好不容易安頓下來，就一動不如一靜，委婉辭謝了他的栽培和美意，并推薦了航校教官查履坦担任總台長，一年以後，王司令調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昆明司令由張有谷接替，情報總台長也換了張士傑，有一次日本飛機空襲昆明，延誤了情報，美軍十四航空隊的飛機來不及起飛應戰，在地

面被炸毀了十幾架，張司令和張總台長經軍法審判，坐進監獄，情報通信軍士槍決處死，這件案件，和一九三七年周家口機場被炸，空軍大隊長高志航被炸死，把開封情報處長槍斃情形差不多，我幸好那次沒有接受王叔銘的邀請，做這總台長。

空軍無線電總台，直屬航空委員會，係空軍通信總樞紐，綜合全軍通信業務責任，工作遠比昆明情報總台爲重，我在總台工作兩年，初爲副總台長，不久爲總台長，大部份負責實際作業任務，真是戰戰兢兢，日以繼夜，如履薄冰，雖確實做了不少的事，但也出過些不小的毛病過失，幸好長官們都能支持我，信任我，給我協助和諒解，使我平安渡過，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處分。

在總台成立不到一個月，某一晚上，發報台忽然起大火，把那木造房屋一棟瞬間整個燒光，我因住在總台附近，一聞火警就趕到現場，指揮

機務股長陸君才，機務員敖鳳翔等大家奮力把機器全部救出，并立即用帳篷架設，維持通信，使工作沒有受到影響，應變得宜，頗為上級嘉許。又我在副總台長任內，除技術行政管理業務外，人事經理，副主管最好少去過問，因此有時間訓練部屬進修技術，我覺得一個技術人員，要有做到老學到老的習慣。古語謂「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保持現狀，就是落伍，我因為通信學校兼任教課，常把學校所教的東西，和總台實際所用的東西，相互密切配合印證，使學用合一，同事們對我這一點觀念和作法，很有同感，大家通力合作之餘，潛心進修，或辦短期講習，或分組討論，奮發研究，努力學習，造成一種優良風氣，以後總台優秀的人員，空軍其他各單位，爭相調用，滿佈空軍，成為日後空軍通信的骨幹。

六月六日(一九四二年)中國工程師節，三女強國在成都沙河舖出生，彼時空軍總指揮毛邦初和參謀處長羅機正在迪化，試飛迪化到伊甯的新航線，我在成都督導裝試定向通信，成都離伊甯直線有三千哩，距離相當長，技術上遭遇到困難，經多次研究試驗，始獲通達，我因忙于工作，幾乎病倒，玉玲就在此日午夜臨盆生產，鄉下沒有醫院，午夜進城一時找不到車輛，由母親在附近找到一個產婆，用舊式土方法接生，把國兒接到人間，幸母女平安，母親因玉玲生下三個女兒，素以重男輕女的她，甚為失望，加上家裏人口多，負擔重，幾幾乎想把國兒送給人家收養，

玉玲性情內向，未敢多反對，我因工作忙，沒有太重視此事，詎料母親居然在鄰居中找到一位航委會地圖科長廣東人林理甫夫婦，因無生育，來到我家想收養國兒，因我不在家，母親到真正關鍵，又不敢作主，結果林理甫夫婦失望歸去，在當時鄉下農村家庭，把生下的女兒送給人家收養或做童養媳的，司空見慣，女兒多的送給人家收養的很是普遍，我的堂姐妹，有好幾個是生下來就送給別人收養的，這事對她也無可厚非，好在沒有成為事實，否則是我家的一個絕大遺憾。

這年農曆除夕，強兒小腸疝氣復發，劇痛了一整夜，次日新年初一，玉玲同我送他去華西壩醫院掛急診，醫生檢查後說要開刀割治，母親因正值新年，信迷信，認為不吉兆，要待過了年後割治，最後還是決定住進醫院，馬上動手術，把小腸疝氣切除一大節，經過一個禮拜痊愈出院，全家才補過一個歡快的新年。

有一次美國空中堡壘式重轟炸機 B-29 隊，由杜立德上校率領，夜襲東京，返航時隊形飛散，迷失航向，一架一架零零落落迫降在浙江麗水衢州等地，我在半夜接獲到通信情報，立即轉報總指揮部參謀長張廷孟，由他下令急電有關飛行場站馳往救助，使人機減少損害，事後獲得美軍函致總部稱謝讚揚。

貽誤情報軍法森嚴

成都外圍有好幾個飛機場，敵人空襲頻繁，某天中午，從昆明方向來了一批不明飛機，沒有我飛機飛行動態報告來電，也沒有敵機情報消息

，空軍總指揮毛邦初要急于知道是我機或是敵機，以便下決心處理，拍一個電報要我查清楚，我匆匆走去報房裏查來往飛機，並沒有這批飛機情報，回報毛總指揮，毛氏即電話三路司令部判定為不明飛機，拉起空襲警報，下令我機起飛備戰，以防萬一，飛機出動起飛後，總台報務長楊士驥外出返台，再去報房詳查來電記錄，原來那是一批我機由昆明飛成都，早有飛報拍來，被譯電士放在抽屜來報欄裏，沒有傳譯處理，等我立即電話司令部改正錯誤，解除警報，起飛的飛機在落地時，也許由于技術不佳，或是飛行員心情太緊張，竟自己摔傷了五架之多。這一個意外重大損失，固然是由于飛行員技術過失，但報導源于飛報漏報，誤放警報，這和上年昆明情報總台貽誤情報，飛機在地面被敵機炸毀，司令總台長坐監獄，情報士槍決，案情很近似，都是因為通信航誤，損失了飛機，所不同的是前者飛機是被敵人炸毀，後者是自己飛行員技術不佳摔毀。事關重大損失，處分可重可輕，真使我惶恐萬分，自請處分，好在承通信科長鄧志堅，主辦參謀張瑞棠兩同學，筆下超生，簽報給毛總指揮，給我一個記過處分，譯電士開革，使我很慶幸未遭牢獄之災，真是「朝裏無人莫做官」，然而我對這次過失，沒有把報房電報紀錄細查清楚，業務處理不深入，疏忽之責，無可推諉，心極不安。

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初，總台隨航委會由成都推進到重慶，重慶比成都更近敵人武漢基地，又係戰時首都，中央機關多，幾乎整天都在警報聲中，通信時時在緊急備戰狀態，加上戰時生

活程度特高，軍民擁集在重慶，物價昂貴，辦公室眷屋住宅都不容易找到，家住在成都，比較經濟方便，且空襲顧慮少，于是玉玲等就搬進城內和淑妹家附近居住，妹丈周洪濤任通信學校教務主任，家住在鹽道街校舍內，強兒在進市立四維小學，我一人隨總台去重慶，總台駐紮在郊區復興關過去彭家花園。不久，總台長程培豐調印度工作，我升充總台長，工作責任更重，就由總台派一部便車，把母親和玉玲及兒女等接來重慶，在總台旁邊用茅草蓋了一棟小屋，此地疏散方便，強兒華兒進復興關小學，步行一公里，由總台派一位工友接送。

重慶是一個山城，天然防空洞和人工防空洞很多，彭家花園有一個大隧道，空軍指揮所，重慶情報所，交通部長途電話台都在隧道內，航委會周至柔主任和參謀處長羅機，經常要來指揮所督導，空軍在這一段期間，時時刻刻在準備作戰，任務繁重，我們的飛機防空出擊，偵警巡邏協助陸軍聯合作戰，以及深入敵後担任游擊部隊的運輸和補給空投，送糧秣，送鈔票，工作晝夜不休，無線電總台是指揮作戰中心，一切命令報告，由這裏傳達，我差不多無論晴雨時候，不分日夜，都在總台工作，區域內督導業務，寸步不敢離開，每到一個工作處所，身旁總離不開電話機，應對處理緊急事務。

衡陽會戰，國軍被日軍圍攻了半月之久，空運大隊長衣復恩，副大隊長楊興國，在黑夜中空投械彈糧食，連續半月，衡州縣城面積不大，爲了使空投物資投下容易命中，不致落在郊外敵人

陣地，我們約定了信號，在適當時刻，由守軍在城內用大堆木柴，燃燒火光爲號，無線電總台，担任對飛機和對地面守軍電台中繼連絡，傳遞情報及天氣報告，指示點火時刻，分秒不得差失，發號司令任務重要，我在這半月期間，整夜晚不能休息，親自督導通信，幸能圓滿達成任務。惜因敵軍攻勢過猛，衡陽終致棄守，守將師長方先覺呈上致蔣委員長最後一電，決心與城共存亡，并謂來生再見，壯語如斯，令人可歌可泣，這最後一電，是經過總台收到，由我傳譯報到委員長侍從室，第二天全國報紙，大登特登，一致頌揚崇敬方先覺師長爲一典型愛國革命軍人，但事隔廿年，我和方師長竟在台北街頭邂逅相逢，經打聽始知他已官拜中將，并任聯勤總部戰略計劃主任委員。

電子工業雷達初用

航委會通信科長，爲空軍通信幕僚主管，原任科長潘明，陸軍大學畢業後，調去當軍參謀長，遺缺奉派由我繼任，我于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一月交卸總台長，就任通信科長，通信科是航委會科級人數最多業務最忙的一個單位，科員參謀督察工程師共廿多人，每天公事數百件，舉凡全軍通信勤務規則考核，器材修護補給核定，學校部隊訓練方針，人員調補籌措，以至經費控制運用，和航委會有關科處，直接間接，洽商協調處理，忙不開交每天公務電話，來往不停，遇到長途電話線路不好，電話聲微弱，還要高聲吼叫，因此我因拍電話時間太多，常常弄得嗓門總是啞啞啼啼的。

航委會會址在城內上清寺，我家住彭家花園總台附近，因空襲疏散較爲安全，不便搬家，兩地相距六公里，我每天拂曉，由家裏空着肚子出發步行上班，經過復興關，上班是下坡路，要步行一小時，下班是上坡路，要走一小時半，中途爬一個兩百多階級的石坡，中午在航委會搭一頓中餐，下班後也是空着肚子回家，在通信科工作兩年，這樣上下班的來回走，戰時生活如是辛苦，但爲了抗敵救亡圖存，工作還很有勁，毫無怨言。有一段時期，英國把我國對國外交通唯一的大動脈滇緬公路封鎖，使美國租借法案給我們的大批通信器材，屯積在仰光，不能內運，我常飛去昆明，向美空軍十四航空隊接洽借器材，并調派通信學校教官陳光斗常駐昆明任美軍連絡，十四航空隊也只靠一條從印度到昆明的航線，空運噸位有限，供不應求，在極度困難情況下，我一面致力擴展和改進本軍無線電修造廠業務和技術，并向外和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器材廠和中央無線電器材廠加強技術連繫合作，總算勉強渡過那段時期的難關，中央電工廠在重慶小龍坎，廠長馬師亮，無線電器材廠在昆明，廠長方際運，兩位做事很有氣魄和抱負，腳踏實地把兩廠建設得極具規模，已逐漸走向生產自造成功之路，可惜大陸易手，兩廠未及撤退來台，馬方兩氏也身陷大陸，我在台灣以後幾年，鑒于美援日漸減少，爲了發展電子工業，曾大聲疾呼，幾經奮鬥呼籲，終以資金市場技術種種困難，支持者不多，一直沒有遇到像馬師亮方際運兩位不避艱難，實事求是的工業家，和我發生同感共鳴，使我對那段時期

和他們的合作，不勝珍惜和懷念，從那時候起，我便深深體會到外援終久不能依靠，過份依賴外援，祇有喪失自己信心和能力的國家要獨立自主自強，一定要自力更生，要自己有良好的工業基礎。

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由美軍人員任司令，中方由徐煥昇任副司令，從此中美空軍并肩作戰，攜手合作，更趨密切，戰果也更加豐碩，通信技術和裝備，都是由美軍補給，不斷進步更換新式器材，超短波無線電剛剛在空軍應用，美國飛機先我換裝新通信機，爲了要中美聯合作戰，我們飛機通信裝備，也必須迅速配備更新，徐副司令來到我辦公室提出這個要求，而且任務時間都極急迫，我便急飛昆明，和十四航空隊通信處長威廉姆交涉接洽，承他撥足我們足夠的器材，派遣了足夠的機械人員，馬上分別飛到有關各飛行基地換裝，並立即在昆明成立了一個超短波無線電訓練班，訓練我方維護人員，在最短期間，建立了一個劃時代的新式通信系統，我在昆明接洽公事，告一段落，爲了酬勞美軍人員，宴請他們十幾人，席開兩桌，吃的是紹興酒，我和他們一乾杯，大家客人吃得瀟灑，我還應付自如，回憶當年，我似乎很有點酒量。

雷達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發明，比原子彈領先幾年使用于戰場，根據報紙所知，雷達在英國建立了不少功勳，我知道美國第十航空隊史屈梅爾部和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的飛機，在機頭上都裝有一種雷達瞄準器，能在黑夜中或雲霧裏搜索敵機，對着敵機瞄準射擊，命中率比肉眼準確得多，且不受限制，美軍勤務人員，對這種新武

器非常保密，我們無法深入了解，即使時常和我接觸公務上的第十航空隊技術代表朱蘭成博士美籍華裔也對我們守口如瓶，我們不知道此種新鮮裝備專門名稱，大家就叫牠做「照妖鏡」，有的人叫做「貓兒眼」，我們技術如此落後，可悲可笑。

在我們的野馬式 P-51 戰鬥機的尾端，有一種機尾雷達警報小機器，沒有被拆下，但是我們的機械和通信人員，事先也沒有發現牠的用途，有一次第四大隊野馬式戰鬥機羣，出擊南京明故宮日軍飛機場，遭遇到敵機從機尾跟踪而來，忽然機尾雷達發生作用，信號燈發紅光，警報鈴聲大鳴不已，飛行員立即警覺到，發現後面有一批敵機追擊而來，於是領隊用無線電話廣播下令，大家一個個爬高翻身，居高臨下，對準敵機，扣上機關槍，迎頭痛擊，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一共擊落敵人零式戰鬥機九架之多，這是雷達在我空軍首建奇功的第一次，我機任務完畢，安全降落湖北恩施基地，四大隊通信長余啓泰把這次勝利經過，電話向我報告，我立即派科裏工程師王可全飛往恩施，搜集資料和器材，從事雷達研究。

民國卅三年冬（一九四四）日寇部隊攻陷桂林柳州，沿黔桂公路進佔獨山迫近貴陽，幾十萬軍民，湧向四川雲南兩地撤退，我奉派赴貴陽收容通信部隊，沿着川黔公路一帶，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但見餓殍遍野，難民成羣攜老扶幼，呼天怨地，妻哭子嚎，慘不忍睹。

汝璣胞弟在黔桂鐵路宜山站任工程師，與弟婦黃秀珍兩人分別逃難來渝，秀珍先到重慶，璣弟晚幾天也到，兩人只有身上穿着一件夾衣，行

李盡失，身無長物，不數日，汝璣汝璣夫婦和小孩以及魏延年外甥兄弟也陸續先後從桂林輾轉逃到重慶，二伯父母及汝璣哥夫婦從北碚趕來相晤，大家齊集在城內小樑子楊春叔家，老中小口廿幾人，虎口餘生，歷盡險苦艱辛，大家團聚在一塊，恍如隔世，相互訴苦，時而飲泣不已。

我們在重慶驟然增加這許多親屬，食住衣物供應，十分艱難，于是由楊春叔汝璣和我大家儘量設法安排，我先把汝璣夫婦在空軍建築處找到一份技術員和文書員的工作，外甥魏延年弟兄兩人和汝璣，分別在空軍電話隊和無線電總台補士官缺，汝璣自己設法，返回農民銀行復職，這樣大家都有個棲身之所，在這難民聚集的戰時首都，實在不容易，直到抗戰勝利，魏延年弟兄回南昌返鄉，汝璣夫婦返回湘桂鐵路復職，大陸變色，除汝璣汝璣隨政府撤退來台灣外，延年由台灣去日本留學，汝璣汝璣以及二伯、楊叔、汝璣等全家，都留在大陸。

勝利復員工作忙碌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五月，軸心國德國投降歐戰結束，八月六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到日本廣島，把廣島全市炸毀，九日又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于長崎，使長崎全市頓成廢墟，兩地死傷幾十萬人，八月十五日，當我正在辦公廳宿舍午睡的時候，和同事空運科長王曠佐猜爭辯，并打賭敵人會不會投降，話猶未了，忽然街道上人聲鼎沸，爆竹鑼鼓歡聲喧天，收音機不斷廣播，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我從床上馬上跳躍起來，高興得眼淚一直往外

流，八年浴血抗戰，千百萬同胞生命財產犧牲，幸賴領袖英明領導，全國軍民奮鬥到底，天助人助，最後勝利終於到臨，這該是何等的喜悅，與高采烈，歡欣鼓舞，都希望趕快重回故鄉田園。

復員接收是一件極為艱巨複雜的工作，誰也沒有預料到這突然的勝利，事先確也一點沒有準備，真是千頭萬緒，航委會立即編組了十六個空軍地區司令部分別接收受降每一個地區，成立一個通信課和一個通信區台，第一批南京通信區台，首先出發，課長劉仁寬，區台長程文東，隨同空軍受降司令張廷孟飛赴南京受降，我國受降總代表何應欽將軍，日方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受降日期為九月三日，同盟國由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為代表，在東京灣美軍密蘇里航空母艦上舉行受降簽字，我國派徐永昌上將參加簽字，政府為了紀念這個光榮偉大的日子，以後就訂九月三日為軍人節。我們每一個通信區台，到達目的地以後，不僅要担任空軍通信，其他各接收的機關，以至于各報館，因為交通運輸關係，電台成立沒有空軍這樣快，在受降初期，各機關的通信，都要從區台收發，電報堆積如山，工作人員，日夜辛苦非常，在抗戰期間，通信人員和器材并不充裕，沒有很多的儲備，一旦勝利忽然到臨，業務組織一下擴充幾十倍，地區範圍普及全國真是絞盡腦汁，羅掘俱窮，難以招架。巧媳婦難做無米炊，吃力又不討好。俗云：「窮則變，變則通」，在接收開始的一個短時期，先是利用日本的通信人員和器材裝備，由我們派遣少數人員，指使他們和我們工作，日本人服從性很好，很聽我們的指揮

，因此工作績效很好，以後日本戰俘陸續被遣返回國，我們則利用他們留下來的裝備，繼續由我們自己人操作使用，在這一段接收期間各類接收人員都在接收敵偽物資財產，有的還趁着機會，假公濟私，營私舞弊，大發其國難財，并常以勝利者自居，欺壓淪陷區同胞，弄得違法濫職，紀律蕩然，使淪陷區同胞切齒痛恨，怨聲載道，稱接收人員為「重慶客」。

一九四五年十月，蔣委員長電約共產黨首領毛澤東由延安飛渝會談，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伴送毛澤東來重慶并保證其安全，國共兩黨領袖相聚一堂，國家光明在望，舉世矚目，全國軍民上下莫不翹首慶幸，詎料毛澤東在渝月餘，雙方談判意見條件不合無結果又回延安，使國人大失所望，同年十二月，美國總統又派馬歇爾將軍來華備調停國共兩黨紛爭，促使中國和平統一，馬氏與國府代表張治中，共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翻譯為皮宗敢，（我軍校六期同隊同學）經一月多的努力還是失敗，馬歇爾返美，于是共軍叛亂軍事繼續擴展，藉俄國之助，在東北把接收日本大批軍火、器材撥交林彪部隊，使共軍如虎添翼，日益壯大，而我國家遭此長期戰爭，民不聊生，經濟崩潰，土氣低落，社會秩序不寧，最後國軍軍事節節失利，弄到全部撤離大陸。

十二月十二日，四女強英在中央醫院出生，我因工作忙，好久沒有回家，等到玉玲生下英兒并在醫院生病發高燒，我才接到華兒來信告知，趕去醫院探望，母親因玉玲連產四女，極不高興，使玉玲時常暗自飲泣，婆媳兩代年齡有差距，有時不易協調，但亦無辦法。

勝利後日軍遺留下來的防空雷達器材很多，我們對於這門新技術，懂的太少，同時戰後防空情報機關只有裁撤，防空雷達不如戰時重要，因此沒有好好利用，除一部份撥作教育實習器材外，大多數拆下存在庫房裏保管。後由航委會教育處向美軍交涉要求訓練我方雷達人員，未獲美國同意，乃轉向英國交涉，由我國自備費用，不久雷達訓練方案，接洽成功，準備選派留英人員。我因復員通信工作大體已經辦完，擬趁此機會出國進修，在抗戰期間，本來有很多機會赴美受訓，但因家累大，逃難空襲，安全顧慮多，現抗戰勝利結束，後顧無憂，乃向上級表示擬參加赴英學習雷達，最初航委會周主任認為通信科很快就要擴充為通信處，希望我繼續服務，徐圖發展，後經教育處長王衛民向周主任極力說明并推薦，卒獲同意，但因通信科長繼任人選，物色不合周主任之意，經人事處長羅機四度簽報，最後總算核定由印度空軍支台長甘蘭聲調回補充，我免除通信科長職務，派赴英國受雷達訓練，担任副領隊，一禮拜後，甘蘭聲由印度飛返重慶，當我把業務交代完畢，千斤重担子，如釋重負，大有無官一身輕之感。在通信科整頓兩年業務上雖異常繁重，磨練經歷，確也進益不少，尤其勝利復員一段時

招考學員赴英受訓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一月，我在重慶把

期，士氣如虹，大家興奮有勁，工作極為愉快。通信科職務交代以後，隨即考選學員赴英接受雷達訓練，先是由各單位精選十員具有大學理工系畢業資格，績學優良的通信工程人員，繼由機械處長曾桐主持考選委員會，我襄理其事，登報招考民間合格人員十二員，兩共廿二員，并由教育部推派浙江大學理學院長胡剛復擔任領隊，負責對外學術上連繫，我任副領隊，負責管理連絡，學員考選完畢，馬上就辦理出國手續，這時政府機關大部份已經搬去南京，我由重慶乘空軍飛機赴京，那是一個大雪天，氣候寒冷，飛機上沒有解冰設備，爲了航行安全，傍晚就降落在漢口過夜。下了飛機，驅車經過市面，一時百感交集，在抗戰前，我在漢口工作過一年，而今漢口市面景色大非昔比，氣象蕭條，行人稀少，過去比較好的建築多半被破壞或是年久失修，當年的繁榮熱鬧不復存在，使人感着分外淒涼，想到八年來同胞在淪陷區水深火熱中生活，遭受痛苦和蹂躪，不禁心酸淚下。承漢口地區司令沈延世盛情招待，我住在璇宮飯店，該飯店是在抗戰前因一部外國名電影叫做璇宮艷史而築造而命名，是當年漢口最豪華一流旅館，現在却殘舊不堪，房間裏沒有暖氣，沒有洗澡設備，也沒有餐點供應，門窗玻璃破裂，油漆掉落，寥寥幾名茶房，無精打彩，顯得非常冷靜，我在外面找了個館子吃了飯，乘着人力車，在市區內跑了一圈，滿目瘡痍，百廢待舉，戰後復員工作，相當艱巨，道經日

本租界，只見那日本僑民，羣集在幾個廣場，擺着地攤，廉價拍賣衣物，準備回國，長長縮縮，狼狽不堪。當年戰勝凌人盛氣，不復存在，可恨亦復可憐，抗戰八年，這一筆血債如何清償索還，回到旅館睡覺，前思後想，興奮、快樂、忿怒、仇恨、同情種種心理，相互交織變化，想個不休，一夜輾轉未能成眠。第二天上午，天氣放晴，我先赴地區司令部拜會沈司令，中午由漢口飛南京，到達大校場，站長歐陽杰告訴我，昨晚飛行員吳飛由漢口飛來一架運輸機來京，因天氣不好，撞山失事，聽悉之下，不禁愕然，因爲我昨日傍晚在漢口機場搭車去旅館的時候，正遇着吳飛，他告訴我漏夜續飛南京，要我坐他的飛機，我因漢口爲我住過的熱地方，想藉機會看看戰後的情況，婉謝了他的美意，沒有搭上他的飛機，生死祇是一念之差。這種情形，也很類似我那次貴陽「二四」大轟炸，得免于難。人的命運禍福，大概都是上帝天定。

南京因爲中央政府復員遷來的人多，民衆陸續還鄉，市面遠比漢口熱鬧，旅社餐館、茶樓酒肆，常是客滿。歌廳舞場，生意特別興隆，可是一切大型建築物、飛機場和馬路等等，也和漢口一樣，年久失修，破舊不堪，足見日本人在佔領期間，只是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并未有一點建設，我們在街道上不時遇見日本徒手軍人走過，他們見到中國軍官，都要舉手敬禮，狀至恭敬，一付可憐可恨相，我真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把他們碎屍萬段，但我政府却寬大爲懷，把血海深仇的敵人，不念舊惡，要以德報怨，所以亦無可奈何。辦理出國手續，相當麻煩，要走遍好幾個大小機關，這些機關又是從重慶新近搬到南京。辦公處沒有上軌道，文卷人手不齊全，公事東推西扯，不乾脆俐落，于是在南京一住，就是半個月，每天沒有事，和一些空軍同事，不是吃館子就是跳舞，有時跳舞跳到通宵，飲食起居毫無定時，生活相當腐化，同事們都是比我早到南京辦理接收的，或多或少弄到了幾個接收橫財吃喝花費，多係由他們請客。有一次在跳舞場碰到一位通信科前任書記毛澤華，湖南人，他本是一個窮極好賭的人，聽說還是毛澤東的遠房兄弟，但無法證實，他這次被派隨南京地區司令孫桐崗參加第一批接收工作，發了一筆不小的橫財，堅持要大請我一頓客，被我再三婉辭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因爲冤枉錢太多，狂嫖爛賭，抽鴉片烟，娶姨太太，東窗事發，釘鐐入獄，足證一個人沒有節操，終久是會失敗的。

在南京辦理手續告一段落，我便去上海找領隊胡剛復博士，他正在家和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商討浙江大學復員問題，家裏客人很多，他告訴我浙大要辦遷回浙江，他一時不能分身，同我們一道去英國，要我帶領學員們先行。上海還是和當年一樣，十里洋場歌亭舞榭，紙醉金迷，大馬路一帶幾家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惠羅，窗櫺裏洋貨充斥，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物價比四川內地便宜，我和英兒購了一大箱代乳粉，和兒女們買了一批橡膠鞋，這都是在重慶難以買到而且價錢很貴的東西，在上海事畢，回到南京，把事情辦完，便搭機飛返重慶。